



论吴文化的开放性与吴地区域发展

庄若江

众所周知,吴文化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是一种孤立封闭、保守僵化的文化。泰伯早在 3200 多年前不远千里的奔吴之举,不仅造就了远古时期中原地区到长江下游地区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迁徙与互动,也开启了吴地打破文化封闭、接纳异质文化的先河。而吴地原住民也并未排斥外来者,主动接受先进文化,其开放包容、乐于变通的人文精神已经萌芽。可以说,吴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本土文化,而是中原文明和江南本土文明的结合体,吴文化的开放性与生俱来,吴文化的历史就是不断开放、吸纳、升华的历史。



江苏人文社会科学讲座

223

—

吴文化的开放性一以贯之,这可以从历史典籍中找到佐证。关于勾吴古国 700 余年历史,见诸于文字的记载并不很多,但是从仅有的文字记载中已能粗略窥见当时吴地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古吴国从寿梦时代开始纪年,并有了国事的记载。从史载文字看,古吴国历史上对国家施政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大多来自异邦,比如,辅佐吴王阖闾成为中原霸主的辅臣伍子胥、伯嚭都是楚国人,





对吴楚战争取胜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军事家、《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则来自于齐国。而寿梦时期的申巫臣、申狐庸父子,其行为举止虽然被许多国家所鄙视,但是因为能为吴国带来实际利益,也被吴王寿梦所接纳。而吴王寿梦破楚服越、争霸中原的计划也因此开始实施。申公巫臣原为楚国著名贵族将军,因与楚王争美,带着夏姬出逃,而遭到许多诸侯国的鄙视。寿梦却知人善任,包容缺点,在他们的助力下,组建了吴地首支骑兵与水军,加之治军有方,因而西敢与强楚抗衡,北能与齐鲁交锋,吴国始强。在军事技术上,齐国的兵学传统,晋国的车战技术,楚国的水战之道,均成为吴国学习借鉴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好计谋、重诡诈、善变化”的吴人兵法。伍子胥曾向阖闾提出“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廩,治兵革”的建议,得到了阖闾的采纳,乃令伍子胥重建城廓。正是因为敢于大胆启用人才,接受建言献策,吸纳先进文化,善于开放包容,所以到阖闾夫差时期,终于跻身“中原五霸”之一。

行遍天下的吴船,似乎是吴人开放心态的最佳佐证。早在春秋时期,吴人就已轻舟如梭,所向披靡。吴王阖闾、夫差,由于有了骁勇善战的水军,军事势力一度达到鼎盛,他们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称霸一方。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夫差开始启动伐齐之战,他在长江北面的邗江(今扬州境内)构筑了一座邗城,开通了邗沟,以沟通长江和淮河。随后又打通了沂水和济水,从而完成了北伐齐国的运兵通道和粮草通道。《左传·哀公九年》记曰:“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攻齐之路远达一千公里以上,开挖运河的工程十分浩大。夫差的这次运河开挖工程远远早于举世闻名的战国时期的郑国渠和灵渠,更成为后来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先驱者。





尽管这次的攻齐并未完胜,夫差的过于自信,导致了海战的失利。但早期吴人的胆量和走出去的雄心却不可小觑。公元前484年春(鲁哀公十一年),齐国出兵攻鲁。鲁求救于吴,夫差再次率军伐齐,于夏天爆发了艾陵之战。这一次,夫差联军大败齐国军队,凯旋而归。由于有了便利的水上通道,一方面使得吴国在逐鹿中原的历史舞台有了亮相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吴人善于走出去的豪放心态。

在博物馆中,经常可以看到吴地出土的青铜礼器,它们既是重要的艺术品,也是实用的器物。这些吴地的礼器,从器形和工艺上看,既有模仿中原文化的痕迹,又富于吴地的文化特点。与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相比,吴地礼器器壁较薄,花纹纤丽,多用镂空,体现出吴地特有的灵动、细密、精致的文化特质。而产自吴地的青铜宝剑,更是工艺精湛,精美绝伦,众口皆碑,是远古各种青铜工艺的集大成者。

开放吸纳、兼收并蓄的文化风气,在吴地民间呈现出特别善于包容的特性。在吴地,至今随处可见纪念范蠡、伍子胥的庙堂,虽然他们都是楚国人,伍子胥辅佐吴王强国,而范蠡却助越灭吴,这对当年战场上的“死对头”,今天却成为吴地人民共同敬仰的对象,人们对伍子胥、范蠡一视同仁,百般崇敬,在尊奉“相天法地”的伍相的同时,也将范蠡尊为“文财神”、“尚圣”,在苏州、无锡的许多地名、路名、园名上都可以看到后人的追思和纪念。



二

吴文化的开放性,是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发展的。远古时期国家的兼并与重组,使不同的地域文化得以快速交





融,历史性地赋予了吴地文化以兼容开放的特质。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使吴地在疆土上与越土融为一体,经过了大规模战争的整合,吴越文化发生了更多的互渗,变得更加水乳交融,正如《越绝书》所描绘的那样,“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后来的人们也习惯将这一区域的文化统称为“吴越文化”。

公元前355年,楚灭越,长江下游地区统归楚国版图,吴地大部成为楚国春申君的封土。吴地在原有的吴越文化系统中又融入了许多楚文化的因子,文化内涵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同样处于长江流域的吴文化和楚文化——这两支先进的地域文化相互吸收和融汇着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和丰富着本体的文化。

黄歇生活的年代正值楚国危亡之秋。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死后,黄歇设计使楚太子逃回楚国继位,是为楚考烈王,黄歇随即被任命为宰相,并封为春申君,赏赐淮北十二县为食邑之地。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改封黄歇于“吴墟”,即苏沪一带(吴故都在越、楚灭吴的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破坏而成为“废墟”,故名“吴墟”)。黄歇封吴后重修城郭,构筑宫室、仓库,开辟“吴市”。西汉时司马迁曾到此游览,曾感叹“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可见黄歇新建的宫室相当宏大壮丽。黄歇还是历史上治理太湖水系的第一人,当时吴地近海口处还是一片泽国,黄歇率众疏通了吴淞江,开浚了黄浦江,使这块冲积平原逐渐成为鱼米之乡。春申君父子“治吴凡十四年”,融合了吴、越文化,发展了江东经济,使之成为“东楚”富足之地。

楚地东扩,使楚文化与吴文化融为一体,融合后的吴楚文化互相吸纳互补,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之翘楚。吴墟作为吴楚文化融汇的纽带,春申君可谓功不可没,从那时起,长江三角洲一带逐渐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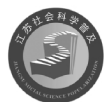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楚文化的浸润和吴文化的开放,使楚文化在吴地处处留痕。南京又名金陵,亦源于楚威王灭越尽取吴国故地以后,“以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名”。上海简称沪,又别称申,亦得名于春申君。上海境内的黄浦江,又称黄歇浦、春申江,简称申江,凡此数称,无不得名于楚国令尹黄歇(春申君)。还有无锡的黄埠墩、春申涧,江阴的黄山、君山,等等,从这些地名都可洞见楚文化渗透影响吴地的流风余韵。

三

政治的风云变幻也是影响吴地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吴地民风原本“蛮勇彪悍,因而司马迁说“吴人尚武”,班固也说“吴越之君皆好勇”。然而,在不断爆发的政治动乱中,这一风气逐渐发生了改变。在过去 2000 多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规模不一的人口迁移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造成人口流动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但人口流向却都是江南,这一人口流动大潮无疑也是造成吴地人口结构变化和文化风气改变的重要原因。历史上中原每一次大的政治变动,就会引起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最大规模的三次流民浪潮分别发生在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唐末和五代战乱、北宋靖康之变这些大动荡时期。

西晋建立后,武帝司马炎将司马氏家族的子弟都分封为王,分取赋税,集权涣散。因为继武帝位的惠帝弱智,皇后与皇太后由此展开了长达十六年的争权,八位诸侯王则开展了争夺皇位的内讧,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内乱给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以可乘之机,怀帝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匈奴攻陷洛阳,掳





走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晋室南渡,西晋灭亡,史称“永嘉之乱”。中原民众不堪忍受战乱之苦,纷纷越淮渡江南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北方人口南迁规模更大。截至南朝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达 90 多万,占当时南方总人口的 1/6。迁徙的游民给南方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开始向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土地利用率。

爆发于唐代中期、绵延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对北方的经济文化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但是,由此而导致的又一轮大量人口、资金、技术、资源的南迁,却带给吴地后来的繁荣发展以极大的机遇。至南北宋之交,金兵挥戈南下,宋室南迁杭州,中原士庶再次携老扶幼南渡,中原精华荟萃东南。一方面导致文化的重心的向东南转移,另一方面,大量北方贵族的南迁再度为吴地的变异和经济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大量北方士族阶层的涌入,为吴地文化注入了“士族文化”的精神内涵,使得吴地的文化增添了许多“阴柔的”、“诗性的”的因子,雅化了吴地文化的审美取向,清秀、温婉、纤柔、静雅逐渐成为吴文化的重要特色。由是,吴地文化的“江南特质”日益清朗,吴文化也终于完成了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型。加之吴地经济的发展和后世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吴地的文化经济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

魏晋之后,随着文化中心的南迁,在南北文化、中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吴人再次展现出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日益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对文化品味的向往,共同促成了诗意江南的诞生。具有才学修养的人被视为高居社会前沿和能够引导生活潮流的群体,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偏爱,全民化的崇文重教之风变得理所当





然,可以说吴地文化的开放性正是促成风气转变的重要催化剂。

四

从地理位置和形态上看,吴地的地域范围主要在太湖流域、长江下游一带。这里通江近海,信息发达,交往便利,溯长江,可直上荆楚巴蜀;环太湖,可周行浙皖赣;沿运河,可贯通京杭;济沧海,可横跨大洲。密布的水网与开放通达的地理环境,深刻地影响了吴地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较为开放文化心态。

不过太湖属于浅水湖,水域虽然辽阔却温润不乏粘滞,如果仅有太湖,吴地文化则不可避免会出现封闭问题,然而贯穿吴地的大运河和顺流而下的长江,恰到好处地为吴地文化增添了许多通达开放的气度。吴地水网密布,很早造船业就很发达,扩大了吴人的活动范围。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宋代以后对漕运的充分依赖,更加速了吴地与中原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也推动了江南地区逐渐纳入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因为大运河的沟通,吴地与外界的交流更为广泛,在粮食、棉布、蚕丝的大宗交易中,在纺织、铸造、冶炼、印刷等技艺的交流和戏剧文化的传播中,吴地不断扩大着与外部的经济文化的互动,这种完成于水上的互动使江南地区逐渐纳入到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可以说,大运河的开通,不仅贯通了中国的南北,也让吴地在大一统的中国开始扮演新的历史角色。“夜半江声听不住,南船才过北船来”,就是古人对当时繁忙的水路运输场景的形象书写。

大运河不仅为吴地带来的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繁荣,也在客观上造就了吴地文化开放包容的情势,因而吴地人在心态上对新





生事物、异质文化有着特别的包容和接受度。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吴地的率先崛起,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吴人善于接受新思想、善于审时度势的文化性格。首创现代民族工商企业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凭借开阔的视野,敏锐发现并捕捉了商机,于1895年在无锡创办了业勤纱厂,从而开启了无锡现代工商实业崛起的序幕。1904年,周舜卿在家乡无锡东土笋(今周新镇)创办了裕昌丝厂,也是得益于上海经商的广博见识。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荣氏兄弟更是善于吸纳创新,在企业管理中引入现代管理机制,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率先注册了知名商标“兵船”。

吴地的自然生态是文化生态的根源和基础。吴人性情中的聪明灵动、活跃机敏是水文化的充分体现。多水的环境养育了吴人灵活善变的文化性格,使之善于使船,敢于闯荡。同时,水的多样性、丰富性以及通江近海的地理特点,也决定了吴人文化心态的开放性、包容性。吴人对先进思想的吸纳接受,和吴地山水孕育的智慧灵动的个性,使吴地的近代文化整体呈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特色。梳理吴地百年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每当机会来临,吴地人民总能先人一步抓住机遇率先发展,无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工商业的首度崛起,还是文革结束后乡镇经济的超常发展,抑或是21世纪初的经济结构转型,历史一次又一次印证了吴地文化的开放进、灵活性,也印证了这种开放灵活特性对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推动力。

吴地自然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实践培育了吴人开放的文化心态,这种开放的心态又和吴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一起造就了吴文化开放性的特点。历史上,这一区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诞生过不同名称的文化形态——比如“吴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等,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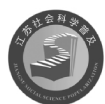


无论其称谓为何,它们都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开放性、兼容性和吸纳性。近世上海的崛起,使吴地的“水文化”发生了改变,在“湖河文化”中凭添了许多“海洋文化”的意味,这主要表现在吴地文化既有的开放包容、善于吸纳的气质和神韵,在上海开埠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与张扬。上海的崛起与繁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其独特的通江靠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人群的快速聚集,各种文化的吸纳,共同构建起上海“海纳百川”的杂糅文化景观,也为吴地的水文化增加了大气和活力。

五

在历史的此消彼长中,因为开放,吴地风气逐渐从尚武走向崇文,吴地的历史人物逐渐从“战胜攻取”的武士,渐渐转变为“峨冠博带”崇文重教的雅士。开放的胸襟、善于吸纳的风气,使得吴地的知识分子敢于打破固有的思想束缚,大胆抒发胸臆,在工商被视为不入流的“末技”时,吴地知识分子却积极提倡“经世致用”、“实业救国”的思想,这一先进理念成为吴地发展经济的思想支撑,也是影响民间风气的思想基础。

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吴地民间重商风气的有机结合,使近代以来的吴地人才呈现出技术化、实用性的趋势。林则徐的弟子吴县人冯桂芬,在鸦片战争后对国势衰微满怀忧虑,他在《制洋器议》中写道:“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而更





多的吴地知识分子则以一种理性的姿态寻求着救国之术。1865年,无锡人薛福成写下《上曾侯万言书》,以睿智的眼光观察世界大势,剖析国运危局,提出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向西方学习军事技术等一系列进步主张,受到了曾国藩的赞赏。1875年,苏州人王韬在《变法自强》政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变法的概念,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比之当时国人的封闭心态,王韬可谓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因为有着开放吸纳的心态,徐寿、华蘅芳等率先将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学等理论引进国门,极大丰富了国人的知识结构。

吴地文化的开放性、务实性,还促进了吴地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紧密,它不仅表现在锡商的群体性崛起,而且涌现出了陈翰笙、秦柳方、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一大批新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家群体,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时代的演进变迁中,吴地知识分子总是得风气之先,延至上世纪20年代,借助厚实的基础,许多吴地后生纷纷留洋海外,学习西方先进文化,顾毓琇、胡刚复、胡明复、周培源、裘维蕃、邹承鲁、辛一心、钱伟长、唐敖庆等人,均成为国内各自学科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

由于无锡工商实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升,许多成功的工商实业家投身教育,斥资办学,成为推动近现代教育的一股坚实力量。在吴地,家境殷实的家族少有单纯藏金储银者,而多将金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方面。早在宣统三年(1911),无锡县出国留学的人数就已达122人。至民国9年(1920),无锡已有出国留学学生241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杨氏家族的杨景燧、杨荫杭、杨荫榆、杨荫樾、杨荫溥等,胡氏三兄弟胡刚复、胡敦复、胡明复,顾氏家族的顾毓琇、顾毓琿、顾毓桢,薛氏家族的薛桂轮、薛学海、薛学潜,以及著





名教育家高阳、吴稚晖、陈翰笙、陈西滢等。在小学教育尚未普及的时代,一个县留学人数竟高达数百人,出现了别处罕见的“一门五博士”、“一门三博士”的人文景观。吴地“人尚文”、“多儒学”,读书之声“遍于闾里”,这种崇文重教风气的形成,究其原因,开放性是促成此风的因素之一。吴地,不仅是古代的“状元之乡”,也是今天科技文化人才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坚实的人才基础有力地支撑起了长三角地区的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吴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结果。三千多年来,吴文化以开放进取的姿态不断吸纳融合着各种文化因子,在演进嬗变的历程中不断扬弃发展,文化内涵得到了极大的充实、丰富和提升,随着吴地经济的快速提升,吴地文化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吴文化的开放性不断推动着吴地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反过来强化了吴文化的开放吸纳的特性,二者互为影响,互相推动,在吴地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成为推动社会前行的重要内驱动力。

(本稿由无锡市社科联推荐)



庄若江,江南大学影视传播系主任,江南文化与影视研究中心主任,全国视协高校艺委会理事,江苏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无锡市美学学会会长,太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台湾女作家散文论稿》、《当代中国抒情散文鉴赏》、《城市文化论》、《无锡望族》、《说吴》等著作和《江南望族》、《阿福过年》、《说吴》等影视作品。

